

传统体育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叶欣^{1, 2}, 陈偲锦¹, 陈莉^{2, 3}

(1.河海大学 体育系, 江苏 南京 210098; 2.河海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98;

3.重庆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 重庆 400044)

摘 要: 以嵌入性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为框架, 探讨传统体育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机制。通过“主体-空间-行动”的分析维度, 揭示传统体育如何通过关系互嵌、认知互嵌、文化互嵌与结构互嵌, 积极推动多民族社区从“物理共存”向“情感共生”的跃迁。研究发现, 传统体育的实践形成“身体规训—符号共享—惯习调适”的动态循环: 在主体层面, 通过代际传承与跨族群协作重构文化资本; 在空间层面, 以物质设施、精神符号与社会网络的三维作用建构社区认同; 在行动层面, 借助共建共治共享机制激活治理韧性。然而, 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面临主体断裂、空间分异与制度悬置的三重困境, 通过“身体赋权-空间融合-多元共治”的优化路径实现文化再生产与共同体形构。研究凸显传统体育作为“活态文化载体”的社会功能, 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为治理现代化提供可行的学理参照与实践方案。

关 键 词: 传统体育; 民族互嵌式社区;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中图分类号: G85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006-7116(2025)03-0024-10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via mutually-embedded national community empowered by traditional sports

YE Xin^{1, 2}, CHEN Sijin¹, CHEN Li^{2, 3}

(1.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2.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8, China;

3.Schoo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Chongqing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framework of embeddedness theory, community theory, and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theory,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sociological mechanism that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via mutually-embedded national community empowered by traditional sports. Through the analysis dimension of “subject-space-action”, it reveals how traditional sports can actively promote the multi-ethnic community from “physical coexistence” to “emotional coexistence” through relational, cognitive, cultural and structural embedding. It is found that the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sports forms a dynamic cycle of ‘physical training - symbolic sharing - habitual adaptation’. At the subject level, cultural capital is reconstructed through inter-generational inheritance and cross-ethnic collaboration; at the spatial level, the community identity is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three-dimensional roles of physical facilities, spiritual symbols and social networks; and at the action level, governance resilience is activated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co-construction and shared governance. However, traditional sports in mutually-embedded national community is faced with the triple dilemmas of subject breakag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stitutional suspension, and need to realize cultural reproduction and common body construction by the optimized path of “physical empowerment - spatial integration -

收稿日期: 2025-04-27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传统体育传承发展研究”(24&ZD206)。

作者简介: 叶欣(1980-), 女, 教授, 博士后, 硕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体育社会学、移民社会学。E-mail: hhyexin@163.com

pluralistic co-governance". The present study highlights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raditional sports as a "carrier of living culture", empowering mutually-embedded national community to forge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so that providing feasible theoretical references and practical solutions for governance modernization.

Keywords: traditional sports; mutually-embedded national community; forging a strong sense of community for the Chinese nation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当代中国维护国家统一、促进民族团结与社会和谐的战略基石,也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任务。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1]在该理念的指引下,探索传统体育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体育研究中需求迫切、价值高显。

民族社区传统体育的发展与共同体意识的形成在多维度结构关系下互嵌,传统体育在这一场域中作用彰显,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本研究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为场域,传统体育为对象,在嵌入性理论、共同体理论和协同治理理论视角下,基于“主体-空间-行动”分析框架,阐释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生成机制、实践样态与行为模式,剖析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困境并给出优化策略。旨在探讨传统体育在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实践中如何“去隔阂、强认同、促共融”,为持续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与社会共同体发展提供可推广的学理依据和实践思路。

1 文献回顾

1.1 民族互嵌式社区样态及治理

“民族互嵌式社区”于2014年5月首次被提出。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出台有利于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的政策举措和体制机制”。同年出台《关于全面深入持久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意见》。2021年8月中央民族工作会议强调“逐步实现各民族在空间、文化、经济、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全方位嵌入”,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载体,其理论内涵经历了空间形态向主体关系的深化。早期研究多聚焦于物理空间嵌入,强调多民族混居格局对民族关系的重构作用^[2]。王延隆进一步指出民族互嵌式社区本质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在社区场域的实践样态”^[3]。学界一方面从民族构成与空间结构^[4]等宏观层面理解互嵌;另一方面从文化、情感、利益、精神^[5]等微观维度分析互嵌,试图打破互嵌式社区的“机械团结”,实现“有机团结”。

1.2 异地搬迁社区多民族互嵌与共同体形成

异地搬迁是精准扶贫的“五个一批”工程的重要

脱贫措施,多民族异地搬迁社区伴随这一实践应运而生。新型城镇化背景下,多民族异地搬迁社区呈现“多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特征,学界关于民族互嵌式异地搬迁社区的研究主要从文化转译、融嵌共建、互嵌实践等方面探讨社区建设策略、路径及机制,主要体现搬迁后民族互嵌式社区共同体建设的重要性、嵌入及路径。因空间转变及再造,形成“新主体陌生人社会”^[6]的结构特征。因此,少数民族搬迁群众面临心理断裂与失落,各民族维系的情感心理、价值体系、社会规范逐步消失^[7]。嵌入方面一是嵌入主体,分为个体嵌入和群体嵌入,多以心理、认知、文化、交往、情感嵌入^[8]为主;二是嵌入客体,包括社会结构、社区环境、社会网络、居住空间、文化习俗^[9]等;民族互嵌式社区共同体的建设路径主要以党建引领^[10]为主导,结合社会支持^[11]模式,探索社区治理共同体建设,包括社区重建、文化融入、心理介入^[12],服务供给、基础产业^[13]、就业帮扶等方式,相关文献鲜少从民族共同体角度,探索互嵌式异地搬迁社区的共同体建设。

1.3 传统体育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学界以往聚焦传统体育如何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关注点主要集中在3个方面。一是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传统体育具有提升民族教育、优化乡村治理、增强民族认同感和凝聚力、促进社会整合^[14]、提升国家文化自信^[15]等重要功能,能够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抓手,部分学者总结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经验,包括空间、结构和认同^[16]等人与环境交融的维度,也包括学校教育、非遗传承、赛事活动、乡村建设和全民健身^[17]等具体实践维度。二是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价值耦合。在治理层面,传统体育促进共建共治共享。通过满足文化传承^[18]、促进经济发展^[19]、利于社会稳定^[20]等方面,构建良好社会治理共同体;在民族层面,传统体育促进交流交往交融。通过凝聚民族认同感,传统体育赛事^[21]及民族节庆活动加强民族间交流交往交融^[22]打造民族共同体。三是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实践路径。传统体育的载体主要包括县域、社区、学校、个体等层面。县域层面的传统体育主要依托大型运动会等活动^[23],促进居民提升文化自信,铸牢中华民族

共同体意识；社区方面的传统体育主要依托“包容性社区”^[24]的打造，打开多民族交融的“阀门”。学校层面的传统体育，主要依托学校运动会、体育课程等方式，促进传统体育与现代体育的融合，助推传统体育的传承。个体层面的传统体育基于个人爱好，通过网络等方式传播与发展。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助推机制主要仰赖政府、市场、社会^[25]等多元主体的参与。

综上，已有研究关注传统体育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二者的因果关系及价值契合，这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何以可能”提供宏观把握与内涵指引。诸多研究关注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微观实践路径，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宏观把握、内涵指引、实践范例整合性研究。本研究旨在尝试解读和阐释相关机制、模式和困境，以期探索出一套传统体育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路径模式。

2 理论基础与分析框架

2.1 “嵌入性”“共同体”与“协同治理”理论

嵌入性理论。在社会学领域，嵌入性理论被用来研究社会网络对个人行为的影响。个体被视为嵌入在复杂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节点，其行动受到网络中其他成员的影响。这种理论框架有助于理解社会现象的形成和发展，以及个体在社会结构中的位置和角色。嵌入性理论将行为主体的决策联结具体社会情境，注重社会现实与行为主体的相互作用。其一，体育文化作为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共同体意识嵌入；其二，构建分析框架，在多主体参与治理的民族互嵌式社区构建多维空间。

共同体理论。滕尼斯在其著作 *Gemeinschaft und Gesellschaft: Grundbegriffe der Reinen Soziologie* 中最早提出“共同体”概念，“Gemeinschaft”因此一般译为“共同体”^[26]，也译作“共同社会”^[27]“社区”或“社群”^[28]。它依赖记忆和习惯等自然意志，在血缘、地缘和礼俗文化基础上形成共同价值及融洽情感的结合体。本研究聚焦民族互嵌式社区，实现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形成民族共同体，同时，促进多民族共建共治共享形成治理共同体。

协同治理理论。协同治理理论认为，通过各方的协同合作，可以实现资源优化配置、信息共享、目标共同制定等。协同治理的重点是协商与合作，而不是强制与控制。协同治理理论因其多元主体共治契合民

族互嵌式社区“多元一体”结构，能够从行动维度整合政策、资源实现效能最大化，推动传统体育从文化载体转化为共同体建构的实践路径。

2.2 “主体-空间-行动”分析框架

本研究基于嵌入性理论、共同体理论与协同治理理论构建“主体-空间-行动”分析框架，旨在通过系统整合多元主体、多维空间与创新行动，揭示民族互嵌式社区中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见图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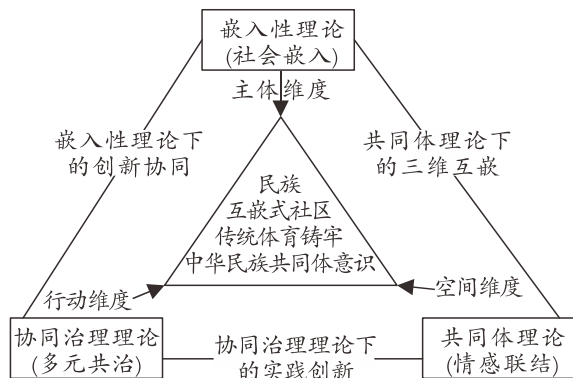


图1 “主体-空间-行动”分析框架

首先，主体维度以嵌入性理论为基础，强调政府、社区组织、居民与社会组织的多元协同。其次，空间维度依托共同体理论，构建物质、精神、社会空间的“三维互嵌”。物质空间通过设施布局优化推动公共空间功能复合化；精神空间借助民族符号的共享叙事和集体记忆建构，强化身份归属感；社会空间打破群体间“结构洞”，重塑社区关系网络，增强社会资本流动性。最后，行动维度以协同治理理论为驱动，聚焦文化遗产、资源整合与治理创新：一方面推动传统体育的现代转化；另一方面通过文体旅融合与数字化平台建设，实现资源高效整合。该框架试图促进民族互嵌式社区从“物理共存”向“情感共生”跃迁，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提供理论与实践模板。

3 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实践样态与行为模式

3.1 场域建构中的传统体育嵌入：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生成机制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国家促进民族团结、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结构建构多维交互。经由共同体意识推进与传统体育发展相结合，从关系互嵌、认知互嵌、文化互嵌与结构互嵌入手，推动传统体育赋能民族互嵌式社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关系互嵌：系统耦合与动态演化。民族互嵌式

社区的日常互动打破了族群边界、建立起跨民族的社会关系。关系嵌入性在于网络关系给社会带来获取信息和资源的作用机制,强调通过社会互动与信任的积累,促进多民族深度交往。就关系嵌入机制而言,社会网络中的关系以信任、承诺和互惠为基本特征^[29]。如云南宣威市恰德村通过举办多民族足球友谊赛,将传统体育竞技转化为社区治理纽带,形成了“体育搭台、文化共融”的社区治理模式,形成“以认知为基础的信任”的标签符号。这种信任的积累,为多民族互嵌社区的长久稳定奠定基础。

2) 认知互嵌:价值共识与认同再生产。认知互嵌的核心在于意识形态引导和教育宣传,构建多民族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社会认同。认知嵌入性是长期形成的群体认知对组织经济行为的引导或限制,它着重关注群体思维、社会认知等对社会行为的作用机理^[30]。如湖南株洲市芦淞区贺家土小学的“民族传统体育校本课程”,通过多民族混合运动队强化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该模式形成“强身健体—文化浸润—情感交融”的良性循环。这种认知层面的嵌入,让居民从被动接受转向主动认同。

3) 文化互嵌:符号共享与多元共融。文化差异的包容与融合是民族互嵌的核心动力。文化嵌入性是传统价值观、传统惯例等社会文化因素对社会行为的制约与影响。文化互嵌通过文化符号的共享与创新,实现多元文化的和谐共生。如云南德宏州将景颇族射箭、傣族孔雀拳等传统体育项目融入跨国马拉松赛事,通过竞技互动打破语言隔阂,赛后联动农耕体验与文化展演,形成“体育促交融、经济强互动”的多民族社区联结机制,推动跨文化认同与共同体意识共建。此类实践表明,文化互嵌并非简单的符号叠加,是通过创造性转化实现体育文化价值的现代重构。

4) 结构互嵌:制度设计与资源整合。结构互嵌关注社区治理模式与资源配置的优化,确保多民族在社会领域的平等参与。结构嵌入性是所嵌入的社会网络给其带来的超额价值,包括信息和资源优势等^[31],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传统体育赋能制度设计需兼顾“多元共治”与“精细化服务”。如宁夏闽宁镇搬迁社区创新“体育合作社”模式,整合政府资金、企业赞助与村民投工投劳资源,建设多功能民族体育广场,定期举办回族踏脚舞、汉族太极拳混合展演活动,实现传统体育资源向社区治理效能转化。

3.2 身体惯习的跨民族传递:传统体育的交往理性与共同体意识实践样态

传统体育作为活态文化载体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中展现出独特的价值维度。通过多主体参与共建、

共治、共享的治理共同体与多民族交流、交往、交融中的民族共同体合力作用民族互嵌式社区,充分展示传统体育助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样态。

1) 共建机制创新:协同共生与制度二重性。在共建机制上,可关注制度设计、主体培育、空间营造等方面。制度设计层面,建立民族传统体育资源数据库,如广西壮族自治区实施的“非遗体育数字地图”,已完成12个世居民族78项传统体育项目的数字化建档。主体培育方面,可重点发展3类社会力量:专业型社会组织、市场型服务企业、自治型居民团体。资源配置采用“公益+市场”双轮驱动模式,如云南昆明市设立的传统体育发展基金通过政府注资(60%)和企业捐赠(40%),年均支持45个社区体育项目。空间营造可注重嵌入式设计。如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打造的“石榴籽体育广场”,将维吾尔族萨玛瓦尔舞场地与汉族太极拳区进行功能嵌套,使不同族群活动空间重叠度达60%以上。这些合作机制和主体参与的创新,实现了协同共生和制度的再生产。

2) 共治体系优化:场域重构与惯习调适。在共治体系上,可尝试构建“价值—制度—技术”的治理框架。价值维度上,建立传统体育伦理公约,如青海制定的《民族传统体育活动行为规范》,涵盖民族传统体育活动的文化尊重、公平参与等7章32条。制度维度上,创新“1+N”政策体系,核心文件《关于体育促进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指导意见》配套实施细则、考核办法等。技术维度上,开发智能治理平台,如宁夏“传统体育云”系统实现纠纷预警、活动调度等6大功能,建立动态评估机制,设置“文化互鉴指数”“交往密度系数”等12项量化指标,西藏拉萨某社区通过摔跤比赛间隙开展“马背议事会”,采用“体育议事厅”“移动协商篷车”等方式创新协商议事形式。

3) 共享模式升级:多元分配与价值跃迁。在共享模式上,可构建物质与精神并重的共享机制。经济收益分配可尝试推行“三次分配”模式:通过传统体育赛事门票、衍生品销售实现市场收益的初次分配;尝试建立社区发展公积金,提取15%收益用于公共设施建设体现二次分配;开展体育扶贫结对,如内蒙古鄂尔多斯蒙古族搏克手与汉族商户形成46个帮扶对子实现三次分配。文化资源共享的治理创新采用双轨机制,文化转译与技术赋能形成双向互动模式。前者以贵州苗拳健身操课程化实现非遗标准化传播,后者通过藏族押加电子判罚系统提升竞技公平性。

3.3 互嵌性社会美学的实践:传统体育赋能社区共同体的行为模式

传统体育作为中华民族共有文化基因的活性表

达,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采用以公共体育空间为物理基础,通过民族文化赋能、民族健康赋能、民族情感赋能的协同作用的“一空间三赋能”行为模式形成实践闭环,推动多民族群体在交流、交往、交融的递进过程中实现共同体意识的深度凝结。

1)跨民族交流:符号资本共筑与互动解码。从跨民族交流来看,传统体育通过“民族文化赋能”打破信息茧房,搭建跨文化对话的符号桥梁,实现符号资本共筑并在活动互动中实现解码。“民族健康赋能”则通过身体实践消除文化隔阂,如甘肃临夏回族自治州实施的“民族健康伙伴计划”,要求各族居民在太极拳(汉)、木球(回)、押加(藏)等项目中必须组队完成技术动作串联。这种身体训练使参与者心率变异系数同步性提高 30%以上,生理指标的趋同化反向促进文化接纳度提升。“民族情感赋能”在此过程中通过仪式空间重塑集体记忆。

2)跨民族交往:边界渗透与纽带再造。从跨民族交往来看,传统体育通过文化符号转译、生理趋同绑定与情感裂变增殖三重机制编织多民族社会网络。“民族文化赋能”构建新型社交货币。如内蒙古通辽市创设的“那达慕信用积分”,将参与蒙古搏克、朝鲜族秋千等跨族体育活动的次数转化为社区治理话语权,此机制使各族群交往频率提升。“民族健康赋能”创造持续性互动场景。如宁夏实施的“民族运动处方”制度,要求社区卫生中心为慢性病患者开具包含至少两项他族传统体育项目的锻炼方案。“民族情感赋能”方面,如藏族青年扎西与回族姑娘马娟因匹配到相同的“民族马术”兴趣而结成训练伙伴,两人合作开发的“青稞马术营养餐”项目已带动 42 户家庭增收。此类案例表明,体育交往中形成的情感联结具有向经济合作、社会互助转化的裂变效应。

3)跨民族交融:情感联结与共同体形构。在跨民族交融方面,传统体育通过民族文化符号创新、生命共同体建构与集体记忆再生产三维机制推进。“民族文化赋能”推动符号体系创新。北京冬奥会期间研发的“冰雪民族运动矩阵”,将满族冰蹴球、鄂伦春族滑雪板与现代冰雪运动融合,使参赛者的中华民族认同感有效提升。“民族健康赋能”促进生命共同体的具身认知。四川凉山实施的“健康盟约”计划,要求彝族、汉族家庭结对完成“健康闯关赛”。医疗监测显示,结盟家庭成员的皮质醇水平(压力指标)差异缩小 60%,生理指标的趋同强化了“生命相依”的共同体认知。

“民族情感赋能”最终实现集体记忆再生产。广西“三月三”体育节创设“记忆之绳”仪式,各族代表将本民族传统体育器具的纤维编织成巨型绳索,在拔河比

赛中共同牵引,这种年度重复的仪式化实践,使“56 个民族一股绳”从隐喻转化为身体记忆。

4 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现实困境

4.1 主体困境:传统体育推广中的惯习传递与共同体纽带联结

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社会整合的具象化载体,已然成为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实践场域。区域发展不均衡格局下的结构性贫困,导致此类社区深陷文化资本再生产阻滞与场域自主性缺失的双重困境,这种结构性张力在具身化文化实践维度尤为凸显,传统体育作为身体化的地方性知识载体,其代际传递链条面临惯习断裂与共同体纽带联结的系统性危机,进而引发文化治理术在社区层面的实践效能耗散。

1)传递惯习的文化符号:代际更迭中传统体育知识的再生产。在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实践场域中,民族互嵌式社区的传统体育经历着文化再生产的结构性断裂。这种代际传递危机本质上呈现为具身化文化资本的代际脱嵌与象征权力再生产系统的双重失灵。其成因可归结为三重结构性矛盾:其一,空间重构中的身体实践断裂。城镇化进程催生的流动性惯习导致传统体育传承的具身化场域瓦解。其二,制度化教育的符号暴力。现行教育体系通过课程资本分配制造了传统体育的象征性排除,这种认知图式断裂直接削弱了共同体意识建构的认知基础。其三,文化资本的商品化异化。在市场化逻辑渗透下,30%以上的传统体育项目遭遇本真性抽离,演变为资本增值的表演性符号。

2)具生实践的文化议题:主体语境下传统体育资本的意义符码。在结构化理论的视域下,传统体育的生存困境呈现为多重社会机制的共谋效应。居民将文化实践让位于经济资本积累的“生存游戏”,传统体育可能成为文化奢侈品,而更为深刻的文化危机源于符号权力的双重消解。一方面,“抽象空间”的扩张挤压了传统体育赖以存续的仪式化空间;另一方面,规训使传统体育被建构为“非现代性”的文化残余,这种文化资本的现代性危机在青少年群体中开始显著。传统体育遭遇既无法满足新型文化资本的积累需求,又难以融入“日常生活实践”战术体系的双重区隔,导致其成为“怀旧符号”,这种文化符码的现代性转译困境,本质上折射出传统共同体解体后文化再生产机制的失效。

3)社区境域的文化锚点:微观社会中传统体育共同体的动态耦合。民族互嵌式社区作为多重文化资本

博弈的异质化社会空间,各族文化惯习的差异构成了“差异空间”,传统体育作为具身化文化资本^[32],其象征效力被限定在本族群的意义之网中,不同族群的体育符号因缺乏共享的“黑箱化”过程,使得跨文化实践的转译通道阻塞。传统体育的仪式化身体实践本应作为阈限体验,却可能在“交往理性”缺失的语境下被消费主义重新编码,这种文化转译的断裂,实质是地方性知识生产的系统性危机。当个体化浪潮消解了传统共同体的稳固纽带,各族青年在体育实践中呈现出选择性传统化,被展演的传统体育可能成为建构差异性的文化装置,而非承载集体记忆的实践体系。

4.2 场域困境:传统体育实践中的空间分异与群体互动

随着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建设,特别是易地搬迁和精准扶贫政策的推动下,在“去地域化-再地域化”的框架中,多民族共同居住的社区形式逐步形成。场域困境是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活动面临的关键问题之一,公共空间效果利用不充分,共同体意识建构效果不佳,不利于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33]。空间营造、空间正义和空间规训等方面较为突出。

1)空间营造下的制度嵌入:传统体育空间资源配置的互动机制。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空间建构中,公共场域的规划策略深刻映射出困境。现有规划范式呈现出显著的空间异化特征:“空间三元辩证法”将社区空间简化为居住容器与经济载体,系统性忽视了作为文化实践载体的体育场域。这种空间配置的失衡象征着用于传统体育竞技、节庆体育活动等项目的广场或体育场地等具身化实践空间在规划话语中声音式微,印证着布尔迪厄“空间区隔即社会区隔”的文化再生产机制。这一空间短缺问题使得传统体育项目难以在社区中得到有效开展和传承,加剧了传统体育项目参与度低、传播难度大的局面。

2)空间正义下的资本书写:传统体育设施资源配置的社会分层。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空间实践中,体育设施的配置失衡构成典型的结构性矛盾。这种空间资源配置的深层困境不仅折射出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代性症候,更在微观层面形塑多民族群体的互动模式。体育空间作为重要的文化实践场域,其资源配置的断裂正在制造新的社会区隔。从空间正义维度审视,公共体育资源的拓扑式分布呈现出显著的梯度落差。在文化适应性层面,体育设施的标准化配置与民族文化的异质性需求形成张力,不同民族群体基于传统惯习形成的体育实践,对空间符号系统有着差异化诉求。这些文化特异性诉求在均质化的现代体育设施中难以获得表征。

3)空间规训下的身体治理:传统体育实践资源配

置的惯习形塑。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空间治理中,公共体育空间资源配置存在显著的结构矛盾。尽管部分社区已初步构建基础体育设施体系,但因空间规划的科学性不足与管理机制的系统性缺失,导致设施利用效能呈现边际递减趋势。研究表明,当前存在三大核心制约要素:其一,设施维保机制的失效性困惑。社区体育场地存在设备老化、功能缺损现象,这种物质空间的衰变直接削弱传统体育活动的承载能力。其二,跨文化适应性的空间配置缺陷。以西南某多民族社区为例,彝族火把节期间的集体舞蹈空间需求与回族开斋节后的休闲健身时段形成冲突,不同族群对公共运动空间的时序使用特征、功能诉求及文化禁忌有显著差异。其三,传统体育项目的现代性转化梗阻。田野调查显示,70%左右的传统体育项目因场地规格的标准化缺失面临传承危机。如苗族“踩花山”所需的坡度地形等特色场域要求,与现有矩形操场为主的建设模式产生结构性错位。

4.3 制度困境:传统体育实践中的政策联动与保障持续性

制度性障碍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的场域建构中呈现出典型的“结构二重性”特征。政策执行中普遍存在的“悬浮式治理”现象^[34],导致制度文本与实践场域产生结构性断裂。

1)时空压缩下的制度行文:传统体育政策供给的执行梯度与实践效能。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再生产的重要载体,其政策实践过程折射出当代中国民族事务治理的深层结构性矛盾。以《关于进一步加强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工作的指导意见》为代表的制度文本,虽在象征层面完成了文化治理的合法性建构,但在政策执行场域中却遭遇国家意志与地方实践的张力。其一,政策执行的结构性困境。在压力型体制下,民族地区政府面临财政约束与发展绩效的双重挤压,形成“政策悬浮”现象。地方政府作为理性行动者,在硬性考核指标面前,传统体育建设往往被纳入“软性任务”范畴,其执行优先级受制于GDP导向的政绩逻辑。其二,政策工具的符号化困境。现行政策多停留于原则性宣示,缺乏可操作性的制度设计。其三,政策联动的碎片化困境。传统体育发展未能嵌入乡村振兴、文化保护等国家战略的协同网络。资源分配层面,文体部门与民委系统、教育系统的条块分割,使得政策执行陷入“多头管理无人负责”的悖论,这种制度性梗阻本质上是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文化治理复杂性的集中体现。

2)资本逻辑下的多主体行为:传统体育政策需求的文化价值与社群自主性。传统体育现代性转型的发展轨迹折射出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中多主体协同失灵

的典型特征。其一,市场主体的参与困境植根于理性选择理论的逻辑悖论。资本逐利本性与传统体育非商业化的文化属性形成冲突,导致市场资源配置呈现“马太效应”,民族互嵌式社区特有的文化生态使传统体育较难完成商品化转换,其符号价值转化为市场认可的交换价值较为困难。其二,社会组织的功能凸显制度环境与组织自主性的双重作用。虽然第三方在文化传承中扮演着“制度嵌入者”角色,但行动策略受制于双重制度逻辑:一方面,行政依赖路径导致组织内生动力不足,项目制运作模式下形成“输血式”发展惯性;另一方面,社会认知度低的场域环境,使得文化合法性尚未转化为制度合法性。

3)工具理性下的市场行动:传统体育政策实施的制度韧性与持续再生产。尽管国家治理体系通过政策文本与财政输入建构了形式合法性,但吉登斯所言“结构化的制度惯性”仍制约着传统体育从符号系统转向实践体系。这种治理困境折射出现代性进程中文化治理的深层矛盾:作为“惯习”载体的传统体育,既未能嵌入科层制组织的常态化运作机制,也难以突破布尔迪厄所指的“象征资本”与“经济资本”的转换壁垒。从组织社会学的视角看,传统体育的治理失效源于双重制度性约束:其一,社区治理结构中专业化组织体系的缺席,使得文化实践长期依赖非正式网络运作。其二,政策执行呈现典型的“碎片化治理”特征,文化部门的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的属地责任在跨区域协作中产生制度摩擦,致使政策工具包中的“项目制”手段可能异化为短期性的符号消费。破解困局需重构“政策-社群”的互动模式,建立文化治理的弹性机制,将制度性资源转化为促进文化自觉的赋能工具。

5 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优化策略

5.1 身体赋权:传统体育的惯习重构与社群文化再生产

从社会学视角审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过程实质上是社会价值整合与文化认同重构的动态实践。基于帕森斯 AGIL 理论框架,共同价值体系的建构构成社会系统适应性进化的文化基质,其生成机制具有维系社会整合的结构性功能。作为符号互动的元叙事,推动族群关系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的范式转换,传统体育作为民族文化的实践形态,通过仪式展演构建集体记忆,以身体规训实现文化惯习传承,并借助竞技符号生产共同体认同。当前,亟需构建制度化的价值整合路径,本质上通过文化再生产策略最终达成费孝通“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社会理想。

1)惯习重构与象征转译:传统体育代际传承者群

体的韧性建构。在民族互嵌社区场域,传统体育实践超越单纯的身体规训维度演化为民族文化接触与象征边界重构的互动仪式。这种文化展演通过“惯习-场域”动态关系,将个体身体体验升华为集体记忆的具身化载体,形成既受制于既有文化模版,又通过实践再造意义网络的“结构二重性”。国家通过将传统体育纳入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完成对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赋权,这种制度性嵌入有效抵御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侵蚀。作为公共文化表演的节庆赛事,则构建了某种意义的“狂欢广场”,青年群体在参与中完成文化资本的积累,实现从被动继承者到主动传承者的角色转换,在保持核心符号体系的前提下,允许次生符号的创造性变异,当传统体育的实践者无意识地内化文化逻辑时,真正的文化自觉就能实现。

2)身体规训与教育编码:传统体育课程标准化的地方性知识调适。学校教育作为社会化进程的核心机制,在民族文化再生产系统中承担身份构建与文化编码的双重使命。布尔迪厄认为,将传统体育纳入教育体系实质是进行符号权力的制度化配置,通过身体规训与文化传递的耦合,实现族群文化记忆的代际传递。课程架构层面,传统体育教育应突破单纯技能传授的局限,构建包含历史叙事、空间实践、意义阐释的三维认知框架。将技术动作解码为文化符号,揭示其背后族群互动的历史逻辑与社会功能。少数民族地区校本课程开发可遵循符号辩证原则,形成既具文化特异性又具普遍可感性的教学范式。学校空间作为典型的互动仪式发生场,通过赛事节庆的戏剧化展演,构建涂尔干意义上的“神圣共同体”。当学生参与投壶、押加等文化表演时,其身体在场转化为文化资本积累的过程,这种具身体验有效突破“机械团结”,催生“认同热情”。

3)文化资本与跨场域流动:传统体育文化符号系统的互构性实践。传统体育跨文化交流作为族群边界解构与重构的实践,构成了民族互嵌式社区社会整合的动态机制。当藏式响箭与维吾尔族达瓦孜同场展演时,不仅实现了文化资本的跨群体流动,更通过“接触区”效应,解构了前台后台的区隔。这种文化实践暗含社会的整合功能,学校与社区作为制度化场域,通过将传统体育纳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完成对地方性知识的合法性赋权,这种制度性嵌入有效抵御了全球化语境下的文化侵蚀。深层观察可见,跨传统体育交流实质是文化模版的重构过程。当彝族火把节中的摔跤竞技与白族三道茶仪式产生符号碰撞,既保持了各自文化 DNA 的核心编码,又在互动中催生出“深度游戏”,这种即兴创造的文化对话,恰恰为民族

文化的创新与互构提供活态实验场。

5.2 空间融合:传统体育的场域构建与共同体意识阈限实践

传统体育空间场域的构建,能够通过“物质空间”“精神空间”“社会空间”3个层面的空间载体,促进民族地区居民对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物质感知、情感认同以及实践内化,从而在可感的成效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35]。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的推广与发展过程中,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是保障传统体育活动顺利开展的关键因素。有效的公共服务设施不仅能够解决传统体育活动中存在的资源匮乏问题,还能够促进多方力量的协同合作,推动传统体育的普及和可持续发展,从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 固态景观与流动现代性:传统体育建设的地方化实践与叙事张力。固态现代性视阈下,传统体育建设呈现空间生产与社会规训的双重张力。国家通过物质性基础建设实施治理术,将族群身体规训纳入现代性治理范畴,如专项补贴政策驱动土司衙署芦笙场域转型为标准化健身中心,实现“合规认同”转化;设施维护与功能更新构成“场域的动态建构”,如环形舞场改造为多功能场馆、木鼓桩让位于塑胶跑道,实质是现代性时间对地方性时间的覆盖。地方政府以“传统体育纳入发展规划”为轴,通过“一村一品”特色村建设、“民族体育+乡村旅游”等产业融合等制度设计,将撒梅射弩、苦聪打磨秋等文化图式嵌入现代治理网络。标准化建设与在地化调适的双重机制,推动传统体育在民族互嵌式社区中的可持续发展。这种空间实践,本质是国家权力通过资本分配重构地方性知识体系,实现传统体育的现代性叙事。

2) 身体铭刻与文化赋权:传统体育技艺的场域扩散与权力让渡。传统体育的当代传承实质是多重资本形式在文化场域中的角逐与转化。政府财政支持构成经济资本的初始投入,市场与社会力量的介入意味着文化资本与社会资本的增殖过程。市场力量的介入本质上是文化资本向经济资本的转化策略,通过赛事冠名将商业符号嵌入民族文化肌理。但这种资本转换存在鲍德里亚警示的“符号价值超真实”风险,借助“过程性社会”理论在文明化进程中建立资本转化的动态平衡机制。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微观场域中,社会组织扮演“场域调控者”角色。民间团体通过“适应”机制将标准化体育设施改造为在地化文化容器,这种空间重构将现代体育规训与传统身体记忆编织进同一张意义网络。而非营利组织在此过程中承担着“行动者网络”编织者的功能,通过动员社区志愿者构建传承网络。

3) 竞技场域与空间锚点:传统体育赛事的治理术悬置与共同体情感动员。传统体育赛事体系的建构本

质是国家权力与地方文化共构的场域实践。官方推动的赛事体系作为符号权力运作的制度化装置,通过“制度性规训”将传统技艺纳入现代治理框架:常态化赛事的时空规训将土司祭典转化为标准化赛事,实现从“习俗惯习”向“制度惯习”的转型。在民族互嵌社区的微观权力网络中,节庆展演构成列斐伏尔三元空间理论的实践样本,政府主导的“文化惠民工程”通过空间锚点再造,使传统体育突破地域限制,在现代体育场完成空间并置。这种空间生产机制既满足现代体育功能需求,又为文化再生产保留象征资本弹性空间。基层“那达慕”与全国民运会形成布尔迪厄的“场域链”,通过资格选拔、积分累积等制度设计,实现文化资本的跨层级流动,将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全民族文化图腾。国家治理的深层逻辑在于身体规训驱动情感动员,继而实现文化认同再生产,赛事推动传统体育融入互嵌社区日常生活,实现民族团结与社会稳定的双重目标。

5.3 多元共治:传统体育的治理建构与制度堕距弥合路径

新时代,政府在群众体育治理中的角色转型与功能性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地位,意味社会体育力量得到广泛参与空间与地位认可,并被赋予群众体育治理的重任^[36]。因而,在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传统体育发展的过程中,构建一个有效的多元主体体育治理模式至关重要。

1) 政策共振与制度共鸣:传统体育推广中多元主体利益的反身性平衡。多层治理体系的场域中,国家权力通过制度性规训占据多元治理的主导地位。政府通过政策文本的生产与资源再分配,构建起传统体育发展的合法性框架。当《少数民族传统体育振兴计划》与“非遗保护条例”形成政策矩阵,完成文化资本制度化认证的同时,通过财政补贴、设施建设等物质性投入,重塑民族互嵌式社区的空间格局。在资源配置层面,通过“体育扶贫工程”与“边疆文化长廊建设”等项目,将经济资本转化为象征资本。这种空间生产机制在偏远地区尤为显著。当苗族跳月场域被纳入村寨基础设施规划,佤族木鼓桩的原始排列让位于塑胶跑道,现代性时间对地方性时间的覆盖以“文化保护”的名义得以合法性。差异化政策的制定则体现布尔迪厄场域理论中的“位置策略”。通过体育设施的标准化建设与在地化调适,既满足现代体育发展的功能需求,又为民族文化再生产保留象征资本积累的弹性空间,最终在柯林斯的互动仪式链中,通过身体在场的共同聚焦与符号共享,将地方性知识升华为全民族共享的文化图腾。

2) 资本嬗变与制度嵌套:传统体育发展中市场机制的社会形塑。当代社会结构变迁中,传统体育正经

历着文化资本与经济资本的双向转化,市场机制构成推动传统体育现代转型的关键动力源。多元主体协同治理模式凸显现代社会组织特征,政府扮演制度供给者角色,通过税收优惠、购买服务等政策工具,培育文化市场的“第三部门”。企业作为经济资本持有者,通过赛事赞助、设施捐赠等市场化手段,将文化资本转化为可持续的经济收益,形成“文化-经济”的共生系统;社会组织依托社会资本网络,在社区层面构建起传统文化传承的微观实践空间,其非营利属性与社区动员能力,有效维系着传统体育的活态传承。这种协作机制,实质是通过制度性互动再造传统体育的现代性特征。传统体育超越单纯的竞技属性,蜕变为承载集体记忆的文化符号,特色体育产品的研发、民俗节庆的创新性展演,实现了对文化模因的现代性转译。这种转译并非简单的形式创新,而是通过文化再生产机制,在保持传统内核的同时构建新的意义系统,从而增强文化认同的代际传递效能。这种合作模式的深化,实则是治理权力的重新配置,政府将专业赛事运营让渡于市场主体,这种治理转型既规避了“文化殖民”的风险,又为传统体育创造市场化生存空间,形成文化自觉与市场规律的价值平衡。

3)社区韧性与制度调适:传统体育参与中社会治理的在地化重构。现代社会治理框架中,社会治理场域的建构实质是政府、市场与社会主体间权力关系的重构过程。基于社会组织作为“第三部门”的治理优势,其参与社会治理不仅体现着“政社协同”的现代治理逻辑,更是实现社会资源活化与治理效能提升的关键路径。激活传统体育组织的治理潜能,不仅能够强化社区文化资本积累,更能通过符号互动构建民族认同的仪式空间,这对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有结构性支撑作用。在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微观实践中,传统体育呈现出显著的文化拓扑特征,社区体育组织需采取“文化敏感型”治理策略: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可挖掘本土体育文化的符号价值,通过周期性展演形成文化记忆再生产机制;在文化接触带,可借助跨族群的传统体育互动模式,在身体规训与文化展演中实现“想象的共同体”建构。通过文化模因的创造性转化,将传统体育升华为社会治理的文化媒介。此种治理范式创新,既遵循了费孝通“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多元一体理念,又通过治理实践将制度优势转化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持续动能。

6 结语

本研究以民族互嵌式社区为场域,揭示传统体育通过“关系互嵌-认知互嵌-文化互嵌-结构互嵌”的

生成机制,形塑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社会学逻辑。研究发现,传统体育作为“活态文化载体”,其价值不仅在于技艺传承,更在于通过身体惯习的跨民族传递、公共空间的符号共享及治理实践的协同创新,推动多民族社区从“物理共存”向“情感共生”跃迁。这一过程深刻体现了布尔迪厄“文化资本再生产”的理论张力,传统体育既需依托代际传承维系文化基因,又需通过现代转化实现符号价值的时代适配。然而,传统体育在实践中仍面临主体断裂(惯习传递异步性)、场域分异(空间资源配置失衡)与制度悬置(政策执行碎片化)的三重困境。其破解之道在于构建“身体赋权-空间融合-多元共治”的系统性路径:通过激活文化惯习和社群的文化再生产,重构促进交往理性,借由“政策共振-资本嬗变-社区韧性”的协同治理弥合制度鸿沟。这种实践范式不仅为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提供了学理参照,也通过传统体育的“去隔阂、强认同、促共融”功能,将“各美其美”的文化差异转化为“美美与共”的共同体认同。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推进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高质量发展 [EB/OL]. (2024-01-31) [2025-04-25]. https://www.gov.cn/yaowen/liebiao/202401/content_6929283.html
- [2] 高文勇,尹奎杰. 民族互嵌社区精准治理的理论向度与实践路径——以贵州省兴义市S街道社区为例[J]. 北方民族大学学报, 2021(2): 47-56.
- [3] 王延隆. 互嵌式社区:强化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空间生产的制度机制[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5, 46(2): 15-22.
- [4] 杨鹏飞. 民族互嵌式社区:涵义、分类与研究展望[J]. 广西民族研究, 2014(5): 17-24.
- [5] 郝亚明. 族际居住格局调整的西方实践和中国探索——兼论如何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区环境[J]. 民族研究, 2016(1): 14-26+123-124.
- [6] 丁波. 新主体陌生人社区:民族地区易地扶贫搬迁社区的空间重构[J]. 广西民族研究, 2020(1): 56-62.
- [7] 任新民,马喜梅. 现代化视角下少数民族地区易地搬迁稳定脱贫实证研究——以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石漠化片区为例[J]. 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37(4): 103-111.
- [8] 刘诗谣,刘小珉,张迪. 流动与互嵌: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结构维度——基于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的田野考察[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1(8): 29-39.

- [9] 杜娟. 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互嵌型社区构建的实证研究——以西宁城东区为例[J]. 贵州民族研究, 2020, 41(12): 71-76.
- [10] 蒋慧, 孙有略.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下民族互嵌型社区治理研究——以南宁市中华中路社区为例[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1, 42(6): 59-66.
- [11] 陈纪, 于亚杰. 推动民族互嵌式社区建设——基于社会支持的一个分析框架[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7, 37(2): 28-33.
- [12] 王曙光. 易地扶贫搬迁与反贫困: 广西模式研究[J]. 西部论坛, 2019, 29(4): 1-13.
- [13] 李怀续, 康露. 体育产业新质生产力培育: 战略要点、突破难点与实践进路[J]. 中国体育科技, 2025, 61(2): 73-84.
- [14] 陈浩然, 周波. 结构功能主义视角下乡村节庆体育文化的社会功能[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11, 45(9): 16-19.
- [15] 马秀杰, 唐双双. 新时代新征程民族传统体育文化的历史使命、价值意蕴、遵循原则与实践路径[J]. 体育科学, 2023, 43(6): 13-20.
- [16] 丛密林. 新时代蒙古族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关键要素及推进路径[J]. 北京体育大学学报, 2022, 45(9): 101-112.
- [17] 白晋湘, 郑健. 交往交流交融: 苗疆传统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三重路径[J]. 体育学刊, 2022, 29(1): 1-8.
- [18] 王智慧. 认知、连接与团结: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机制——基于民族传统体育价值论域的建构与解释[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23, 47(8): 1-11.
- [19] 刘若骞, 王龙飞, 范铜钢. 乡村振兴战略下少数民族特色体育旅游的内涵、困境与优化路径研究[J]. 体育学研究, 2022, 36(1): 43-49+112.
- [20] 刘林星, 李越苹, 朱淑玲, 等. 黄河流域传统体育文化与生态旅游深度融合发展研究[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9(2): 197-203.
- [21] 王智慧. 何以在“村”, 缘何成“超”?——“村超”作为一种社会治理模式[J]. 体育与科学, 2025, 46(1): 30-41.
- [22] 周平, 刘婷, 熊少波. 民族传统节庆体育与旅游产业融合发展研究——以黔东南苗族传统节庆体育为例[J]. 广州体育学院学报, 2017, 37(6): 50-53.
- [23] 杨军, 朱颖芸, 韩春梅.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背景下城市多民族互嵌式社区治理研究——以广西南宁市万秀村为例[J]. 原生态民族文化学刊, 2022, 14(5): 41-50+154.
- [24] 车峰, 周雅琳. 社会质量视域下城市多民族社区治理能力研究——基于19个社区的定性比较分析[J]. 西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3(1): 115-124.
- [25] 顾怡然, 代红兵, 李晋龙. 乡村振兴战略下西南边疆传统体育旅游可持续发展的现实困境与应对策略[J]. 体育文化导刊, 2021(10): 78-83.
- [26] 斐迪南·滕尼斯. 共同体与社会: 纯粹社会学的基本概念[M]. 林荣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27.
- [27] 丁元竹. 中文“社区”的由来与发展及其启示——纪念费孝通先生诞辰110周年[J]. 民族研究, 2020(4): 20-29+138.
- [28] 巫达. 四川尔苏人族群认同的历史因素[J]. 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19-23.
- [29] 麻玉琦, 张蔚文. 府际合作能否改善城市资本错配? 基于网络嵌入视角[J].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4, 54(10): 81-96.
- [30] ZUKIN S, DIMAGGIO P. Structures of capital: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the economy[M]. Cambridge: CUP Archive, 1990: 1-56.
- [31] GULATI R. Alliances and networks[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998, 19(4): 293-317.
- [32] 吉灿忠, 邱丕相. 民族传统体育的文化人类学研究进展[J]. 上海体育学院学报, 2010, 34(5): 39-43.
- [33] 赵芳, 刘楚琛, 谢雄健. 阈限理论视域下节庆体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研究——基于广西三江花炮节的田野调查[J]. 武汉体育学院学报, 2025, 59(2): 61-68.
- [34] 周飞舟. 从汲取型政权到“悬浮型”政权——税费改革对国家与农民关系之影响[J]. 社会学研究, 2006(3): 1-38+243.
- [35] 董德冬, 王炳林. 公共文化服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空间进路研究——以边疆乡村地区为例[J]. 广西民族研究, 2024(4): 68-75.
- [36] 赵述强, 董宏. 新中国成立以来群众体育治理的历程回顾与新时代瞻望[J]. 天津体育学院学报, 2022, 37(5): 539-545.